

党127

内部材料
注意保存



2 026 3190 0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专题教育讲话材料

中共楚雄州级直属机关委员会翻印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前 言

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九号通知指出：“各整党单位一定要对广大党员深入地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重新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努力从思想、政治和组织方面消除派性。”按照未整先学，未整先改的要求，州直机关党委决定，在州直机关进行一次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我们每个党员同志都要认真学习六中全会《决议》，充分认识这一教育的重大意义，彻底清除“左”的影响，消除派性，增强党性，进一步提高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

这个讲话材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宣传部依据六中全会《决议》精神编写的。它论据充分，说服力强，语言生动，通俗易懂，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好教材，特翻印供广大党员学习参考。在学习这个材料时，要紧密结合实际，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提高觉悟，把我们的思想统一到六中全会《决议》上来。

中共楚雄州级直属机关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目 录

- 第一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党犯错误的结果（3—14）
- 第二讲：“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方法都是错误的（15—25）
- 第三讲：“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26—39）
- 第四讲：“文化大革命”本身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值得肯定和继承（40—56）
- 第五讲：只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才能消除派性，增强党性（57—70）
- 第六讲：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71—78）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专题教育讲话材料

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对这个问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有个认识过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科学结论，实际上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所作的完全、彻底的否定。但是，直到今天，在一些党员、干部、战士、学员和职工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有的同志虽然从原则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碰到具体问题时又有所保留；有的同志尽管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但思想却没有完全从“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有的同志对“文化大革命”到底错在哪里，还懵懵懂懂，分不清是非，甚至把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的加以接受和维护。凡此种说明，对“文化大革命”的流毒和影响绝对不可低估，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行再认识十分必要。

随着全面整党的深入发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问题引起了党内外许多同志的关注。实践告诉我们，目前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严重不纯，正是“文化大革命”直

接酿成的，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难以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后果，整党的四项任务（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就不可能完成好。正因为如此，中央和军委负责同志强调指出：现在抓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抓住了关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要一直搞到战士、学员里头去，每年新战士入伍、新学员入校都要进行这一教育。这个问题解决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就能从根本上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就能自觉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的航向继续前进，就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锐意改革，开创四化建设新局面。

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呢？这里，分六讲来谈谈这个问题。

第一讲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党犯错误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是以“革命”的名义，采取似乎非常“革命”的手段进行的。它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开始全面发动，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宣告结束，时间长达十年，亿万人民卷入了这场“天下大乱”的政治运动中。这场运动为什么会发生？它对社会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我们的回答是，“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革命因素，对社会发展起的只是阻碍作用，它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我们党犯错误的结果。

1.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

先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革命？“革命”一词，具有多种含义。从广泛意义上来说，革命就是变革，是用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如文化革命、技术革命、思想革命等等。从革命的本来意义上讲，它指的是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统治，新兴的阶级起来推翻旧的政权。这样的革命是进步的，是推动社会前进所必需的。而“文化大革命”根本就不是这样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曾经被宣传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的重要保证。这样，“文化大革命”就被提到了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就是说，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

后，都必须搞“文化大革命”，否则，革命成果就要丧失，资产阶级就会复辟。但是，实践已经证明，象“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根本就不能搞，搞了只能造成严重灾难，使社会倒退。因而，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第一，“文化大革命”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本来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最早提出文化革命的是列宁，他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多次讲到要搞文化革命，认为这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条件之一。列宁指出，在一个文盲充斥、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国家，不搞文化革命，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我们党在五十年代末期，也提出过要搞文化革命。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提出要搞五个革命；其中就包括文化革命。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并号召开始征服技术落后和文化落后的伟大进军。当时确定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建立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改变我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落后状态。这同列宁所讲的文化革命，基本上是一致的。从以上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文化革命，指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样的文化革命，当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搞的。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文化革命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这场“革命”虽然冠以“文化”的美名，但根本不是促进文化繁荣昌盛，而

是对教育、科学和文化的一场大破坏。“文化大革命”序幕一拉开，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文艺领域。先后批判了《海瑞罢官》、《刘志丹》、《怒潮》、《李慧娘》、《谢瑶环》、《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逆风千里》等电影、戏剧和小说，许多有名望的作家和演员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电影、戏剧停演，银幕、舞台上只有八个“样板戏”，造成了文艺园地的荒芜。教育战线被认为是十七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许多专家、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学校关闭，学生停课，教育停滞下来，文盲增加。据八二年人口普查统计，文盲已有二亿三千万，比“文化大革命”前显著增加。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遭到批判斗争，被关进了牛棚。实践证明，首先从文化开刀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反对和破坏文化的所谓“革命”。

第二，“文化大革命”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本来意义上的政治革命。过去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首先，它不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本来意义上的政治大革命。马克思主义讲的政治革命是有明确含义的。恩格斯指出，“迄今所发生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还说，“一切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这就是说，全部政治革命都是围绕所有制来进行的，即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起来打倒维护旧生产关系的

政权，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都是这样的革命。我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也是这样的革命。而“文化大革命”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始，很快便转入所谓“夺权阶段”。这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向无产阶级自己展开“夺权”的斗争，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其结果只能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和经济的发展，给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其次，在一九六六年的中国，根本就没有进行这种“政治大革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众所周知，当时我国政权已经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手中，在一九六五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剥削制度已经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虽然还不完善，但它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虽然还有某些弊病，但它是保护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对这样的政权，当然不能号召亿万人民起来推翻它。因此，无论是从政权还是从经济制度两个方面来看，都不存在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的任何现实基础。再从“文化大革命”所实际规定的斗争对象来看，也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大革命”。因为，这场“革命”的对象即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在对客观情况作了错误判断的基础上主观臆造出来的。

第三，“文化大革命”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革命。

“文化大革命”曾经被宣传为是一场思想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并把“斗私批修”作为这场“革命”的“纲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革命，本来有对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批评和改造的意思，但“文化大革命”中对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的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直占领导地位，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残余及其影响是不断受到批判和抵制的，根本不存在需要发动一场“革命”来“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那样的条件。同时，它所采用的方法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人的世界观都需要改造，工人阶级也不例外。列宁指出，自发的工人运动至多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要掌握科学世界观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指出，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即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一般的理论的学习，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决定的意义。这就是说，对于思想领域的问题，对于世界观问题，必须靠自觉，靠学习和实践，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去解决，而决不能用强制的方法，粗暴的方法去解决。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混淆是非，混淆敌我，乱批乱斗，无限上纲，坐“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侮辱人格，是根本行不通的。这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改造世界观、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是格格不入的。这样做，思想革命的任何目的都不可能达到，只会给人们的心灵造成巨大痛苦和严重创伤。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

义上的革命，也不可能带来任何的社会进步。

2. “文化大革命”是党犯错误的结果

既然“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那么，为什么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这场暴风，而且席卷全国，持续十年之久呢？除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九五七年以后，党内产生了“左”的思潮，并且逐步系统化、理论化，占据了支配地位。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党内“左”倾思潮恶性发展的产物，是党犯错误的结果。“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决议》已经作了精辟分析。这里，从四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左”倾理论的系统化，并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如果有，它居于什么地位？这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都是个新课题。苏联在完成集体化之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国内阶级已经消灭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民内部的和谐一致。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方面，但说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都不存在了则是不对的。因为，当时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和党内矛盾的大量存在是客观事实，斯大林却把原因归结于帝国主义派进来的间谍和暗害分子，从而搞了肃反扩大化，中央委员的半数以上在肃反中被搞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同样面临着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我们党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

主义改造后，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同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对这个问题作了基本正确的分析，认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次年六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作了科学分析，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起，我们党开始背离了原来的正确思想，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途上越走越远。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后，美帝国主义利用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错误，搞了反共高潮，造成东欧一些党的党员纷纷退党，加上出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这些对我们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向“左”倾发展是有一定影响的。从国内讲，把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错了。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就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由于用“左”的理论去指导实际斗争，又用“左”的做法去搜集材料来印证和补充原来的错误看法，主观上得出的结论当然不可能符合实际，而把一些工作问题、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思想问题看成是阶级

斗争问题、政治问题。当时是这样判断的：农村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中，城市也有相当一部分政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手里。中央先后转发了《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领导权的报告》、河北抚宁县“桃园经验”、天津市郊“小站经验”，肯定了在城市、农村中进行夺权斗争的做法，对于文艺领域的估计是，各种艺术形式和许多部门，问题不少，人数很多，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十多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最近几年竟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可能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对党的机关的看法也很糟糕，认为有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边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了“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对政治形势看得越来越严重了。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过去搞了工厂的斗争、农村的斗争，搞了城乡“四清”运动，但是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来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这种形式，就是“文化大革命”。从原则上讲，警惕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把需要防止的可能性看成现实的东西，从错误的估计出发决定路线方针政策，就必然要犯大错误。

第二，错误的党内斗争和个人崇拜的狂热，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党难以防止“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正确的党内斗争的方针和方法，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受到了破坏，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了这样的先例。会议前期，主要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但

会上真正客观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不很浓厚，有些同志护短，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彭德怀同志看到这种情况，便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希望这次会议把问题揭开，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信的内容是正确的，做法也是合乎组织原则的，但却受到了错误的批判。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支持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也受到了批判。这样，会议由反“左”变成反右，对彭、黄、张、周等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进行揭发批判。紧接着，中央又在庐山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把这场斗争推向了全党。这就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连政治局也难以反映真实情况，讲真话的受到了批判。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又一个原因，是个人崇拜的狂热。可以说，我们中国有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这就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小农人数众多。马克思指出，“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边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在特定气候条件下，个人崇拜就滋长起来了。从当时的情况看，一是党内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鼓吹。在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上，有位相当高的领导人就鼓吹，对毛泽东同志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程度。他的这种错误论调不仅未受到批评，而且还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林彪一九五九年上台后就大搞个人崇拜，他挖空心思地搞这一套是有其罪恶

目的的。他室内的一张卡片上写着：“得一人就得天下”。康生、陈伯达也搞个人崇拜。再一个是毛泽东同志本人受到了这种思想的侵染。他提出有两种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不能搞；一种是正确的，不搞还不行。个人崇拜本来是腐朽的东西，一搞起来就神化领袖，最后把毛泽东同志的话也变成“最高指示”，使他在党内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情况，到一九六六年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共产党之所以有战斗力，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是重要的保证。由于组织上的错误、个人的错误和个人崇拜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第三，中苏论战的影响，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是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原因。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我们党同苏共的分歧从此产生并不断加深。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莫斯科开会，在起草会议宣言时，苏共中央要把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观点强加于各国党，中共代表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同苏共代表团进行了原则争论，抵制了苏共搞“老子党”、指挥棒。一九五八年七月，赫鲁晓夫来我国访问，在会谈中，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严正拒绝了苏方不久前提出的在我国建立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反对了苏联妄图从军事上控制我国的企图。一九六〇年六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开会，苏共代表团对我搞突然袭击，围攻我党代表，我代表团同他

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苏共领导又把中苏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七月份，苏联政府片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从此，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一九六三年七月，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我党进行攻击诬蔑。我党进行公开答辩，连续发表了“九评”，展开了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九评”的意见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有许多是“左”倾错误的论点。把这些“左”的论点当成保卫马列主义纯洁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来宣传，便助长了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我们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同时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运动，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深入到党内就犯错误了。结果把党内同志的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成了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在这种情况下，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而正是这些“左”倾观点的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持续。

第四，党内少数坏人别有用心地利用了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左”倾错误，把它推向极端，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和持续十年的另一个原因。《决议》指出，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林彪、江青、康生等一小撮坏人，

在“文化大革命”前，就以极左面目出现；大搞个人崇拜，骗取信任，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重用，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结成了两个反革命集团，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在党中央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中搞“踢开党委闹革命”，搞所谓“四大”，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受到批判和斗争，党长期依靠的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了排斥，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给了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不少人被提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就更加扩大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这两个反革命集团还盗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名义，蒙蔽和驱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服务，同时对毛泽东同志进行封锁和欺骗；诱使毛泽东同志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总之，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妄图制造“天下大乱”，以便在乱中夺权。

从以上可以看出，党犯错误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如果党不在政治上、组织上犯错误，就不会发生这场持续十年的严重内乱。所以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党犯错误的产物，是“左”倾错误结出的恶果，它并没有历史的必然性。